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文学史系列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上卷)

(第二版)

王庆生 王又平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36

中国当代文学(上卷)

(第二版)

主 编：王庆生 王又平

副主编：李遇春 严 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上卷)(第二版)/王庆生 王又平主编. —2 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ISBN 978-7-5622-4788-3

I. ①中… II. ①王…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477 号

中国当代文学(上卷) (第二版)

© 王庆生 王又平 主编

选题策划:刘晓嘉

责任编辑:刘晓嘉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新视点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46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8.75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言	(1)
----------	-----

上卷 新中国文学

第一章 文学概况和理论批评	(21)
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和文学新体制的建立	(21)
二、由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造成的周期性震荡	(26)
三、理论批评的论争和文学创作的一体化走向	(34)
第二章 小 说 (上)	(47)
一、小说创作概观	(47)
二、赵树理的小说	(59)
三、周立波的小说	(66)
四、孙犁的小说	(73)
五、柳青、浩然等的农村生活长篇小说	(80)
六、马烽、李准等的农村生活中短篇小说	(91)
第三章 小 说 (下)	(100)
一、杜鹏程、梁斌、吴强、曲波等的革命战争小说	(100)
二、杨沫、欧阳山、罗广斌等的地下斗争小说	(109)
三、茹志鹃、王愿坚等的革命历史中短篇小说	(117)
四、“干预生活”的小说和婚恋题材小说	(128)
五、工业题材小说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136)
六、李劫人等的历史题材小说	(144)
第四章 诗 歌	(152)
一、诗歌创作概观	(152)
二、臧克家、田间等现代诗人的诗	(162)
三、李瑛、严阵等新中国诗人的诗	(169)
四、李季、闻捷等的叙事诗	(177)
五、郭小川、贺敬之等的政治抒情诗	(185)

六、新民歌运动和新诗发展道路论争	(194)
七、少数民族的诗歌和诗人	(200)
第五章 散 文	(209)
一、散文创作概观	(209)
二、冰心、吴伯箫等的散文	(218)
三、杨朔、刘白羽、秦牧等的散文	(224)
四、魏巍、菡子等的通讯报告	(232)
五、徐懋庸、邓拓等的杂文	(238)
第六章 话 剧	(246)
一、话剧创作概观	(246)
二、老舍的剧作	(253)
三、郭沫若、田汉、曹禺的历史剧	(258)
四、胡可、沈西蒙等的革命历史剧和现实生活剧	(265)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269)
一、“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文学的全盘否定和严重摧残	(269)
二、“样板戏”和“文革文学”的艺术规范	(276)
三、“文革”时期的主流创作和“朝霞”文学	(282)
四、“文革地下文学”和天安门诗歌运动	(289)

绪 言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20 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方位变革的时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文学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学的这一变革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是从旧文学转向新文学的进程，是文学不断介入社会生活，反映社会变革的进程。

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全面启动了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在百年文学史进程中，不论从本土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还是从外来的思想文化影响着眼，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已具备了有别于古代的现代品格，它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精神取向上，以批判封建主义，高扬人的解放为特征。

其二，在艺术形态上，以探索和建立起现代的文学形态为特征。

其三，在发展方式上，以多元并举、兼容并包的开放性为特征。

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与时代偕行的中国新文学，在经历了 30 年的风雨历程之后，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史称“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承继着五四新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来——它的优长，它的弱点，它的疑惑和问题，以及它内在的文化冲突。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完成性的阶段上开始了它的新起点，因此，它既有对既往的反省，又有对未来的前瞻。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种种迂回曲折，甚至还出现过逆转和倒退，但是从总的发展倾向上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质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逐渐增强的，并且它也以自身的现代性推动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概括和命名，历来都有不同的表述^①。早在1929年—1933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教授就编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用以概括五四文学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新文学发展。嗣后，又有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出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出版）、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出版）、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上海亚细亚书局1936年出版）等著作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自清的学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在自序中说：“《中国新文学史》是教育部规定的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这门课主要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从上可见，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多以“新文学”概括20世纪文学。后来，随着文学的变革，“新文学”这个概念逐渐被“现代文学”代替。为什么被代替？有学者认为：“‘新文学’，虽然一些学者在它的名下作了出色的研究，但正是由此揭示的完整的文学史存在本身，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从告别‘旧文学’的意义上确立‘新文学’的位置，当‘新文学’越来越远离曾经拼命从中挣扎的‘旧文学’的母腹而不断开辟属于自己的疆域时，‘新’就失去了原有的针对性，再‘新’下去就显得不合时宜。”^②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我们现在仍在一些地方使用“新文学”这个概念，但更多的是用“现代文学”来表述“五四”至1949年的文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也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的

① 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各类作品集中，“近代”、“现代”、“当代”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如《近代中国女士著作家小说文选》（上海文学社1932年出版）、《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选》（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太平书局1944年出版），收入的都是“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如冰心、冯沅君、张爱玲、丁玲等人的作品）。

② 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

起点,写到1949年为止^①。至于1949年以后的文学如何表述,在当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王瑶说,“中国的新文学史由‘五四’到文代会恰恰三十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后将另起一个新的时期”,这“另起一个新的时期”是什么名称,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当时在文艺团体和文艺领导人的报告、文件中,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艺月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多用“社会主义文学”、“新中国文学”等词语来表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了变化。有的高校在教学和科研中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有学者指出:“从最早梁实秋之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到周扬自觉以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对新文学运动进行定位;从丁易开始‘以论代史’,以‘学统’融入‘政统’的方式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即《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正式于1962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终于为大家所接受……这标志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以‘新文学’为基点,从而完成了学科内部的分化与整合。”^②北京大学陈晓明也认为:“直到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文学最早的正式命名才由此产生……鉴于建国以后的文学可能被赋予过强的政治色彩,学者们的论说采用了‘当代文学’这种概念。我以为‘当代文学’这种说法具有淡化政治历史印记的潜在意图,相比较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共和国文学’这类说法,‘当代文学’显得更为中性化。当然,‘当代文学’毕竟只是一个历史性指称,不管在学理化上如何是一种中性化的历史描述,其内涵都依然包括着深厚的政治历史标记。”^③

“当代文学”的命名,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而且使“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确定下来,并由此兴起了研究当代文学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提出用“二十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来打通目前存在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

① 这一时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有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孙中田、何善周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吉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

② 陈占彪:《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③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当时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等。

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①。199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中，改变了以前一直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合在一起，统称“中国现当代文学”^②。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五四”至1949年前的文学^③，“中国当代文学”一般指1949年至今的文学。如果从词义上看，有关辞书的解释是：现代：现代的，时髦的，现在这个时代；当代：同时代的，同时期的，目前这个时代。在英语中，“现代”、“当代”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④。无论是“现代文学”中的“现代”，还是“当代文学”中的“当代”，都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新变革紧紧相连，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紧紧相连。可以说，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特征。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问题，也有几种不同的分法。有的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认为《讲话》确立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界碑。把1942年看做当代文学的时间标记，由此出发，可以抓住贯穿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关键性转折，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历史内在变异。有的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我们则以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

为什么以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续，又是社会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起点。从20世纪文学发展的历

① 1985年上半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联合提出建设“二十世纪文学”问题。他们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中蕴涵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的研究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背景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20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文学评论》1985年5期）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的召唤下，现已出版了一批中国20世纪文学史著述。

② 1997年，在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专业目录》中，在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设有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③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一般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界，但也有多种不同的分法，如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起点，以1892年发表《海上花列传》为起点，以1912年民国初始为起点，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以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起点等。

④ 据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modern(现代)”意为：of the present time, or of the not far distant past; “contemporary(当代)”意为：modern, belonging to the present time。

史来看，五四文学革命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40年代的抗战文学和延安文学，都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关系，其中包括张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现代品格，抒写革命与解放的宏大叙事，展开“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继续以白话文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学经验和样式，变革民族民间文学传统，打造文学的现代形态等。从这些意义上说，以第一次文代会为起点的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延伸，又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换的自然发展。但是，这一转换又是在迥异于此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于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新中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文学体制上以一体化为主导，以工农兵为主要服务对象，这同“五四”以来形成的多元化文学格局形成显著比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正是为文学实行上述转变的一个总动员，是为新中国文学举行的隆重的奠基礼，因此第一次文代会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也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捩点。

二

中国当代文学从诞生至今，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历程。根据我国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和文学格局的特点，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文学（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和新世纪文学（2000年至今）。这三个阶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了当代文学既曲折又辉煌的文学画卷。

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文学的创建时期，也是当代文学除旧布新、曲折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战争—革命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处于转变时期的文学肩负着整合和构建的任务。一方面要以解放区文艺为楷模，对已有的现代文学资源进行整合，为构建新中国文学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则要依据第一次文代会确定的文艺方针，构建新中国文学的规范，其中包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造世界观；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坚持普及第一，普及与提高结合；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民族化、大众化为主导风格等。这些规范为文

学的发展、为文学创作开拓了新的空间。广大作家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唱出了自己心中的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目》）除了诗歌，还有一批表现时代、反映新生活的小说、散文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难免有些稚嫩、粗糙，但作为新中国文学的辉煌开篇，却长久地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长河中。继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新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兴盛的繁荣期，涌现出一批至今仍具魅力的佳作，如仅长篇小说就有《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三家巷》、《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大波》、《李自成》等。这些作品同诸多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戏剧等，皆以其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些作品已成为经典，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

然而，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并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顺畅，它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和曲折。就在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左”倾思潮的泛滥，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开始，接踵而来的是1955年对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文艺战线上的所谓“反修”斗争等，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使“左”的激进思潮日益发展，愈演愈烈，从而大大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使作家不敢说、不敢做、不敢写。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陈毅亲自参加了几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①。这些讲话不仅使“大跃进”以来

① 周恩来1961年在文艺工作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这“首要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一种正确的风气”。陈毅1962年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呵！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折廷争：‘你那么修水库是不合科学原理的，修起来有危险的，拿那么大本钱去修，我不赞成，应该坚决的反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在却不是这样，整得科学家都不讲话。”（见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5页、第71页。）

“左”的偏向有所纠正，而且对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等）也发表了重要意见，具有指导的意义。但在这些正确的主张和意见尚未切实贯彻执行时，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代表人物的错误批判，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林彪、江青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于1966年2月合伙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紧接着在全国推行了一条要从根本上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左”倾路线。在文艺界，他们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诬蔑革命文艺路线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贬黜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禁止一切中外古典文学优秀遗产。在这“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十年里，万马齐喑，文苑萧瑟，黑白邪正被混淆，是非曲直被颠倒，文艺创作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境地，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文艺园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黑暗年代，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然而，人民不会屈服，文艺工作者不会沉默。许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站在一起，在斗争中思索，于激愤中抗争，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形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创造了人民的、战斗的革命文艺，给荒漠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曙光。特别是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预示着文艺的春天重新降临。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是当代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通常被人们称为“新时期”。

这一阶段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契机，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它是在中国社会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时刻发生和发展的。新时期伊始，文艺界的任务主要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与此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不可遏止的热情，创作了一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揭批“四人帮”的作品，提出并回答了千百万人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再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悲壮图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文艺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1978年思想界开展了“实践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极“左”路线，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左”倾错误，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30年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开创了文学艺术发展的新局面。此后，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开了多年来禁锢的闸门，冲击着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文艺的复兴。不论在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也不论在主题的深刻性还是题材风格的多样性上，都是过去难以比拟的。自此以后，社会主义文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2000年至今，当代文学随着21世纪的到来跨入了“新世纪文学”。

从已经走过的十年历程来看，这是一个开放、包容、纷繁、丰盈的文学时期，也是一个外延越来越大，内涵越来越复杂的时期，它的滥觞实际上始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迅捷，新世纪文学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这种变革虽不像新时期文学那样热点不断，也不像新时期那样屡有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它的变革却是深刻的。有的学者认为，新世纪文学变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学的世界化色彩越来越浓，中国文学在慢慢地向世界文学靠近、融汇，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不可忽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文学在市场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正在进行艰难的选择与蜕变，它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俯就一些东西；三是信息化、网络化、影视热对传统文学样式的冲击，迫使作家们重新认识文学的性质和功能，考虑自身的适应能力；四是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思想道德文化价值的选择问题，同样成为新世纪文学选择的最大难点之一^①。这些分析是切合当下实际的。由于社会的转型，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以精英文学为主体、作协文联为基本体制的文学一统天下，现在这一构成在20世纪90年代被逐步打破，至新世纪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新格局，即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的精英文学（或称“主旋律文学”、“纯文学”），以出版营销为依托的大众文学（或称“通俗文学”）和以网络信息为平台的网络

^① 雷达：《我们时代的文学选择》，《文艺争鸣》2009年12月号。

文学。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主旋律文学通过经济资助、奖项活动来调控，左右走向，精英文学转向民间，坚持了独立的声音，在学术圈里依然被看好；而一部分走市场的文学则离开了纯文学的追求，向影视媒体通俗读物等方向靠拢，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三种价值取向各得其所，相安无事”^①。文坛“三分天下”格局的形成，使“文学赖以存身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对应着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的变化，市场化、大众化、传媒化联袂而来，文坛在被动的应变和主动求变的两种动因之下，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②。这一变化改变了作家与读者、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使文学呈现出多元丰富的新面貌。过去作家写什么，读者阅读什么，在一体化的体制下是被动的，选择余地很小，现在在市场规律的影响下，文学的写作、阅读与出版，自然随着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就文学类型来说，传统文学的类型比较单一，阅读面比较狭窄，新世纪以来，写作的空间进一步拓展，文学类型更加纷繁多样，既有传统的题材类型，又有适应读者和市场需要的文学类型，如魔幻、惊悚、悬疑、架空、穿越、神秘、灵异、谍战、官场、职场一类的作品。如此众多类别作品的涌现，反映了人们的多样需求和阅读的分化与重组。网络文学的兴起和普及，更成为新世纪文学最具活力的景观。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写作、传播、阅读方式，适应了新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适应了市场和特定阅读群的文化需求。由于网络文学的公共性、动态性和交互性，使人们获得更加自由的广阔空间，使更多的人参与写作与阅读。当然，在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价值观念混沌，文学品位不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引导。但总的说来，新世纪文学正在稳步的发展和建设之中。

三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道路，不难发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经坎坷、曲折，

① 陈思和：《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文艺争鸣》2010年4月号。

② 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风貌与新走向——走进新世纪的考场》，《新华文摘》2010年第21期。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把文学推向灾难的深渊，作家不仅没有创作的自由，甚至连生存的权利都无法保障。从“新中国”到“新时期”，从“新时期”到“新世纪”，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和“人学”的回归，束缚作家的枷锁被打破，文学创作环境进一步优化，文学由一体化走向多元化，由封闭走向开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是我们多年来所期盼的，也是思想解放运动催生的结果。

文学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描写的生活范围和创作领域不断扩大。当代作家创作的作品真实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变革时代的风貌，充分显示出当代文学的实绩。“五四”以来，作家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人生的不幸、家庭的风波、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觉醒，描绘出一幅幅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画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农村到工厂，从部队到学校，从边陲到城市，从现代到古代，无不进入作家的视野之中。不仅描写革命战争和农村生活的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和成就，而且过去涉猎甚少的或者完全没有涉及的工业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老一辈革命家题材、国际斗争题材以及历史题材、科学幻想题材等，都有了长足发展，填补了文学创作的空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题材的禁区被打破，不仅当代沸腾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加广泛的反映，而且那些未被开垦的生活处女地也得到开掘。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山川、乡土、风情、历史、人物，都在当代文学的画卷中得到了反映。

文学的主题从单一转向丰富，从直露转向深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主题比较单一狭窄，为了配合中心，为政治服务，有些作品的主题摆脱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改革开放以来，作品的主题丰富多样，作品的意蕴进一步深化。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从社会思想潮流的表面汲取一般化的概念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熟悉并且受到深深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深入到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力求获得与生活血肉相联的独特的思想发现，在这个基础上提炼主题”^①。这样从生活中提炼的、经过作家强化的主题，既非单一的歌颂，也非单一的暴露；既非政策的形象图解，也非千篇一律的模式，而是表现了作家对时代、对生活、对人生的独特的思索和理解，融进了自己的审美意识。与新中国文学相比，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呈现出进一步深化的趋向。这不仅表现在同

^① 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一题材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提炼的主题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中同一题材的作品题目的迥异。如描写女性的《玫瑰门》（铁凝）、《长恨歌》（王安忆）、《无字》（张洁）等，在主题的开掘上也各有自己的发现。有些作品的主题，也非单向含义所能概括，往往形成模糊多义的统一。文学作品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说明文学对时代、对生活的反映已经跨向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主题的扩大，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了新的突破。以往有些作品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局限于表层，形成了好人一切皆好、坏人统统都坏的格局。人物独特的个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都消融、散失在类型之中、模式之中。新时期以来，作家们把艺术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多方面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复杂性。不论是写英雄人物还是普通人，写正面人物还是负面人物，都一改过去那种从抽象的概念或理念出发的做法，像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那样，使人物性格成为鲜明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多种色彩的有机体，从而呈现出较为深厚的意蕴。比如一批描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作者既写出了改革者摆脱精神羁绊之后所展示的勇于冲刺、勇于挑战的锐气与活力，也写出了他们在改革中的困惑与不安，以及他们在复杂的同事关系、亲友关系、夫妻关系之中的矛盾纠葛。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学中还出现了一批性格复杂的形象，如农民李顺大（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战士刘毛妹（徐怀中《西线轶事》）、学者倪吾诚（王蒙《活动变人形》）、地主白嘉轩（陈忠实《白鹿原》）等。对这些人物，作者不取外在表现，而是着力写出诸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素的矛盾和统一，从而真实地揭示出内心世界的隐秘。这对那种所谓“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程式显然是一种否定的突破。对负面人物的描写也一改过去常见的脸谱化，通过对人物灵魂的深刻剖析，写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有了新的突破。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显示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要求文学艺术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生活，坚持艺术探求，在现代化、民族化的基础上创造个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01页。

人风格，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有些早在“五四”以来就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风格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作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作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更是不断探索并创造多种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用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

茅盾说：“与我们的时代一同前进的作家，尽管各有各的风格，然而在他的个人风格上，一定有时代精神的烙印。”^①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时代的、社会的影响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如人们熟知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京出现的剧作家群，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组成的“探索者”作家群，在边疆地区出现的描写少数民族和边疆斗争生活的云南作家群等。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邓友梅、陈建功等的京味小说家群，冯骥才、林希等的津味小说家群，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的陕西作家群，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家或作家群体的出现，与一个时代、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区的社会风尚、文艺风尚，以及这些地区对文艺人才的发现、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融会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一种文学现象。

就创作方法而言，60多年来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十分深刻的。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法更是走出了新中国文学单一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在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如运用象征、通感、意象等手法反映生活，使诗的意境显得朦胧、深远；使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的潜意识，增大作品的容量，更好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变形、象征等手法，突破戏剧舞台“第四堵墙”的限制，扩展戏剧表现的领域。这样的吸取、运用，大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二是以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运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变形、“黑色幽默”等手法反映社会生活，开拓了作家的视野和艺

^①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